

# 奧利振

Michel Fédou 著  
連蘊琦譯

奧利振 185 年出生於亞歷山大亞(Alexandria)，這是一個深受傳統希臘文化影響的城市。他在一般學科上基礎很是紮實，同時，他自小便開始讀聖經，這使他日後成爲一位卓越專家。於 18 歲那年，奧利振受德敏添主教(Demetrius)委任掌理教理學校，接著沒多久二人卻發生衝突：奧利振在巴勒斯坦接受了該區主教祝聖爲司鐸，致使亞歷山大亞的主教把他逐離教區。約 230 年，奧利振自始離開了亞歷山大亞，他到巴勒斯坦的凱撒肋雅(Caesarea)去，就在這裏渡過了他的餘生。他獻身於教學、講道；同時也大量寫作。他也曾多次到巴勒斯坦境外旅遊，主要是應那些向他諮詢神學問題的主教之邀請。於 249 年，亞歷山大亞爆發迫害基督徒的教難，奧利振遭到囚禁和受到酷刑折磨，毫無疑問，他於數年後約 254 或 255 年去世。

他留下大量著作給後人，當中包括多篇講道、多篇聖經評論、一套論基督徒教義(《論根源》*De Principiis*)、一篇護教文章(《反塞斯》*Contra Celsum*)、數篇靈修文章(《祈禱》*De Oratione*)；《給殉道者勉勵》*Exhortatio ad Martyrium*)...這些著作不幸地，在接著的數世紀，被持不同見解人士利用來攻擊作者。人們責難他；例如指這些著作爲不承認天主聖父與聖言之永恆父子關係的亞略異端做了開路先鋒。雖然這些指責大部份是沒道理的，可是卻對奧利振的聲譽構成損害，以致他的著作有部份被毀掉。幸好當中有部份早已被翻譯爲拉丁文，能夠被傳往西方，並在中世紀時期對釋經學產生巨大影響。

這裏沒法只以數頁紙，便能全面地介紹對多方面也有重要影響

的著作<sup>1</sup>，我只是嘗試回答以下問題：這部古代巨著能否成爲今日中國基督徒的靈感泉源，縱使兩者受著歷史上和文化上的分隔？

## 在一個既定文化中讀聖言

首先必須說的：奧利振的著作反映著在個別獨特文化中的讀經經驗，這爲現代人在其所屬的文化氛圍中，努力地看聖經起著模範作用。

事實上，奧利振從沒間斷過看聖經，研究經文意義，解釋聖經給聽眾或學生聽。他的著作，大部份都是與釋經有關；除了多篇是他講道講解某某聖經章節之外，他也編寫了版本批判；平行比較舊約數個不同版本，他更口述評論某某書。（我們保存著大量他對《雅歌》、《瑪竇福音》、《若望福音》、《羅馬人書》的評釋摘要。）

很明顯奧利振是以希臘文寫作，而且他的演繹必定帶有屬於他和影響他個人的既有文化之痕跡。他熟識猶太釋經學家（較知名的有費羅 Philon）解釋舊約經文的方法，亦致力於準確傳達經文所帶來的神益，而又是在他的文化中所能夠理解的。他尤其堅持指出舊約不是局限於文字上的表面意思，還須要以新約的光去理解深層意思。說真的，聖保祿的歸化事件與《創世紀》或《出谷紀》事件也連著關係，最後在基督光照下得以清明<sup>2</sup>。奧利振這想法在他的著作中隨處流露。他是第一個爲釋經學制定一套正確的理論；還有，在他的實踐中，他總是不斷地實行尋找「聖經的意義」，因此，過紅海這情節爲他來說不單有文字表面意思，更有一重靈修意思（它其實是基督

---

1 整體著作見 H. Crouzel, 《奧利振》，巴黎 1985。

H. Crouzel, *Origène*, Paris (Lethielleux) – Namur (Culture et Vérité), 1985.

2 參看格前 10:4-6；迦 4:22-31

戰勝死亡的預象，而我們藉著聖洗與基督同死以及與祂重生)；它亦有一重倫理道德意思(從戰勝惡的勢力上而言)。聖經的意義有四個層次(字面、寓義、倫理及奧義的意義。「奧義」即奧秘性或末世性的意義)<sup>3</sup>，奧利振是這一切傳統的最初源頭；正如呂巴克(Henri de Lubac)指出，到中世紀是頂峰。

從這觀念可洞察到兩經的整體性——舊約在新約光照下顯明。為奧利振來看，福音本身不單只有表面文字上的意思，它更有一層靈修意思；因此單是聆聽耶穌的話語並不足夠，還必須明達這些話的深層意思，從而發掘它的奧秘，那就是天主聖言和父的根本共融。這並不是說須要等待「第三部福音」來完成新約，而是意味著基督再來一事不會超越基督徒在前進中所認識的天主；剛好相反，他向我們作出了充份的介紹——因為基督是「道路」(若 14：6)，也給祂的門徒開放聖經的鑰匙。

## 信仰的起源學說

讀經引領奧利振對基督徒信仰一致的說明，這在《論根源》又再鮮明表現出來。在這部著作中，奧利振想給基督徒回答一些基本而常會自問的問題：關於天主、天主子、聖神、受造物、世界...，為回答這些問題，那是必需使用理性和希臘式推論的對策。此外；作品屬於那種古人已熟識的文學體裁；哲學家早已對世界的「根源」這問題上作出思考，並就這問題發表過論文。而奧利振正正要指出聖經——那是經由教會傳統所領悟的——能使人對「根源」有一個

---

3 參看呂巴克(H. de Lubac)，《歷史與聖神，根據奧利振看聖經聰敏》，巴黎，1950。  
《中世紀時期釋經，聖經的四層意義》，4冊，巴黎，1959-1964。

H. de Lubac *Histoire et Esprit. L'intelligence de l'Écriture d'après Origène*, Paris, Aubier-Montaigne, 1950; *Exégèse médiévale. Les quatre sens de l'Écriture*, 4 volumes, Paris, Aubier-Montaigne, 1959-1964.

新的理解，即是說首先是父、子、聖神；也包括被創造的世界。

這要付出很大努力才可在一個已有文化中領悟信仰，然而《論根源》對往後被反對者用來辯駁奧利振是需要負大部份責任：人們質疑他所說的—後來更被判斷為與基督徒信仰不相容；尤其是靈魂比肉體「先存」的看法。但不要忘記在那時候，教會對奧利振所引起的問題沒有任何表態，因此，這無疑是給了他們一個答覆，而那答覆可解釋為是善意的。關於奧利振，不管怎樣，他是願意完全忠於教會的教導，只是在所有問題還未得到解決前，他估計他有責任找出令人滿意的解釋，並且防止教友走向錯誤的信理(正如當時的「唯識派」)而背離了信仰。就算他的著作在今日為我們看來顯然是受到希臘主義影響，但這只不過確認了奧利振擔心神學真的「本地化」到何等程度，那只有承受著希臘文化的人才能感受到。

他無論如何要做到準確詮釋聖經，聖經是他的靈感基本泉源。此外，奧利振也有緊貼梵二大公會議的特別用語：聖經有如「神學的靈魂」，在一個這麼重要論點上，奧利振一完成論天主及世界的寫作，便馬上著手在他的最後一本書中探討聖經的釋義問題：事實上為他而言，聖經的研讀並不是站在起點同時也是在終點那麼簡單；剛好相反，聖經的釋義代表著知識的高峰，因為只有釋經容許在天主的奧秘智慧中走得更遠。

### 反論的考驗：《反塞斯》(*Contra Celsum*)

奧利振雖然致力於在希臘文化中指出基督思想的可信性，但他亦要迎擊來自同一文化而持相反於福音訊息的反對者之阻力。

約在 176 年，哲學家塞斯編寫著作以筆戰反基督徒：《真的論談》(*De vera doctrina*)。那不是一部膚淺指控的著作，而是對基督徒信仰的根基(如道成肉身和基督復活的教義)提出根本性的質問，並

且是以希臘傳統先祖名義，或以「理性」本身之名義提出。舉個例子；塞斯對神會取肉軀出現在世上某個角落和在歷史中某確切時刻的信念加以批評。

70 年後，奧利振著手在他的著作中進行徹底的反駁，《反塞斯》(*Contra Celsum*)其實是重提希臘哲學家的指控，並一一加以反駁以保衛基督徒的信仰。這是最大的護教行動，比君士坦丁時期還要早，(比另一部在 5 世紀的傑作；聖奧斯定《天主之城》早得多。)

希臘哲學家抨擊教會教父在身處的希臘文化中信奉基督信仰，這反使我們警覺到只以哲學家的理性思維方式支持信仰是一個假象，這在後來得到一致的認同。奧利振給塞斯的回答顯得意味深長：兩人都承受同樣文化，可是一人成爲基督徒，而另一人卻成爲反基督思想。奧利振的著作不單是在希臘文化中信任基督教義之模範，更是福音受到來自同一文化的考驗和反對中之見證。

這著作，我們常說，在歷史中有一個完全吊詭的遭遇：一方面它爲作者的思想正統性帶來激烈爭論，另一方面它對教父和中世紀的釋經學產生重大影響。最近 20 世紀神學家；例如巴達薩(Hans Urs von Balthasar)、鄧尼諾(Jean Daniélou)、呂巴克(Henri de Lubac)等均樂於強調這位教父對基督徒信仰上的重大貢獻，尤其是對基督徒理解聖經上。歐洲歷史記載了奧利振的工作所遇到的一切波折，在 21 世紀初，我們察覺到那些在做同樣工作的人不屬於西方世界。奧利振邀請基督徒各自在所屬文化背景中理解聖經，並且找出材料來制定一套既忠於教會同時在自己的文化中又是合乎情理的神學。他也讓我們認識到這工作，常遇到對抗和拒絕，然而這正是神學工作的一部份，能夠在順逆同一時間說明從宗徒領受的信仰。